

论宋代闽词的地域特征

刘荣平

(厦门大学 中文系,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宋代闽籍词人的地理分布呈现出时代和地域的不平衡:北宋少南宋多;经济文化发达的北部东部多,相对落后的西部南部少。宋代福建进士是闽词创作的主力军,但只有极少的一部分进士作词,这与词为小道的传统观念有关,也与理学家大讲作文害道有关。词以描写本地风光为贵,宋代闽词主要描写了武夷山、双溪、鼓山、西湖等地的自然风光,显示出深厚历史文化的积淀。宋代闽词蕴含着浓郁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在爱国词与寿词两个方面,这与理学重气节、重伦理有关,又与闽人性情气质有关。

关键词:宋代;闽词;地域;理学

中图分类号: I207.2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48(2022)02-0183-08

On th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Fujian Ci poems in the Song Dynasty

LIU Rongp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Fujian Ci poets in the Song Dynasty takes on imbalance of era and region: there were more poets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960-1127) tha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1127-1279); there were more poets in Northern and Eastern Fujian where the economy and culture were relatively more developed than in the west and the south. The Jinshi (the successful candidates in the highest imperial exams), among whom only a few wrote Ci poems, were the main force of Ci poets. It had to do with the traditional view that Ci was just used for entertainment, and the opinion of Neo-Confucianists that literature did harm to Tao. It is valuable of Ci to be used to describe the local scenery, and the Fujian Ci of the Song Dynasty mostly described the natural scenes of the Wuyi Mountain, the Double Brook, Drum Mountain, West Lake and so on, and displayed the deposition of profound historical culture. These poems contain a strong humanistic spirit, which is concentrated in the patriotic Ci poems and birthday congratulations. The reason for this is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emphasis on moral integrity and ethics in Neo-Confucianism, but also related to the temperament of Fujian people.

Keywords: the Song Dynasty; Fujian Ci poems; region; Neo-confucianism

宋代词体文学在闽地获得很大发展,词人如林,佳作迭出,产生了柳永、刘克庄这样的大家。任何词人生活在一定的地域时空之中,都会受到地域文化的熏陶,从而对其创作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作品也会带上一定的地域色彩。目前尚无有力

度的从整体上论述宋代闽词地域特征的论文,从局部论述者有刘庆云《宋代闽北词坛鸟瞰》、陈庆元《词中的江湖派——南宋后期闽北词人群述评》,都涉及宋代闽北词人的群体活动和创作特色。宋代闽词的地域特征或可从三个方面尝试分

析:宋代闽籍词人地理分布的特征及其成因、宋代闽词对闽地风光的书写、宋代闽词蕴含的地域文化精神。此三个方面互为机理,前二者着眼于空间,后者着眼于时间,从时空两方面着手不失为探讨闽词地域特征的一条路径。

一、宋代闽籍词人的地理分布

据《全闽词》^[1]统计,宋代闽籍词人共161人,其中北宋29人,南宋132人,共作有2295首词(残句每则以1首计),其中知为闽籍但又不能确定具体籍贯者4人。另统计宋代闽籍词人共有88人举进士(含赐进士出身)。朱熹祖籍江西,实际生于南剑州尤溪县(今福建尤溪),一生大部分时光生活在福建,故作福建词人统计。兹以上述统计数据为基础,进一步分析宋代闽籍词人的地理分布状况。

在现存籍贯可考的157位闽籍词人中,首先是建州府和福州府人数最多,建州府44人(建州0人、建阳15人、建安10人、浦城6人、崇安13人、松溪0人、瓯宁0人、关隶/政和0人),福州府44人(福州11人、闽县5人、侯官3人、福清4人、连江3人、古田0人、永泰4人、永贞/罗源1人、长溪/福安3人、长乐5人、闽清3人、宁德1人、怀安1人)。其次是泉州府19人(泉州7人、南安0人、晋江8人、永春3人、同安1人、清溪/安溪0人、德化0人、惠安0人),兴化军18人(兴化3人、莆田10人、仙游/清源5人),邵武军16人(邵武11人、光泽2人、归化/泰宁2人、建宁1人),南剑州11人(南剑州0人、剑浦/南平6人、顺昌1人、沙县2人、尤溪1人、将乐1人),均在10人以上。漳州府和汀州府人数较少,漳州府4人(龙溪3人、长泰0人、漳浦1人、龙岩0人、南靖0人),汀州府1人(长汀0人、宁化0人、上杭0人、武平0人、连城1人)。^①由此可知,宋代闽籍词人主要集中在福建北部与东部,而南部与西部则较少。

建阳、崇安、建安、莆田、晋江、浦城、剑浦、闽县、长乐、仙游、福清、永泰、侯官、连江、长溪、闽

清、永春、龙溪凡18县占全省县数(46)的39%,词人数量(109)约占全省词人(161)的68%,这些县大多主要集中在福建的北部、东部和中部。

福建进士出身(含赐进士出身)的词人计福州25人、建州27人、邵武军7人、南剑州8人、兴化军13人、泉州5人、漳州2人、汀州1人,合计占词人数五成以上,可以说进士是宋代闽词创作的主力军。这一点与整个宋词作者的身份高度吻合,“宋词大约有一半的作品是由有进士身份的人创作出来的”^[2],进士更有条件作词和传播词作。南剑州、兴化军、建州、福州尤其如此,而漳州、汀州超过五成,主要是进士数和词人数均太少所致。这五成以上进士出身的词人共作词1129首,占宋代全部闽词(2295)的49%,也就是说,近一半的闽词出自进士之手,此亦可证进士是闽词的主要作者。另一半闽词的作者主要包括门荫入官者、游幕之人、僧道两家以及女性词人,他们也是宋代的文士阶层。宋代闽籍进士有6713人^[3],依据今天的文献,只有88名进士作过词,占闽籍进士总数1.31%,也就是说,宋代福建科举精英阶层中高达98%以上的人都不作词或未有词作传于世。

综上所述,可知宋代福建词人的时空分布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时代分布的不平衡

宋代以前的福建经济文化落后,教育必然滞后,因而人才较为缺乏,跻身于大作家之列者屈指可数。到了宋代,由于经济发展和政治上受到重视,福建文化教育渐趋鼎盛,科举之风尤为盛行。有学者认为:其表层原因乃是对学校教育的重视,每县皆有官学,普及率达百分之百,远远高于全国县学普及率的44%,因而进士总数居全国第1位;其深层原因乃在于福建山多地少,往往口粮不足,不得不转向从事技艺、经商、出家、海外移民等方面寻求出路,科举考试求取功名自然也成为读书人的首选之路。^[4]³⁵⁻⁷⁸宋代福建词人数居全国第3位^[2]实有其必然性。

① 以上地名,古今沿用者不再说明变迁,古今有变迁者略作说明。建安,今属建瓯市。崇安,今属武夷山市。瓯宁,今属建瓯市。关隶,宋咸平三年(1000)升关隶镇为关隶县,宋政和五年(1115)改关隶县为政和县。闽县,今属福州市。侯官,今属福州市。永贞,今属福州市,宋乾元元年(1022),永贞县改名罗源县。长溪,今属福州市,唐天宝元年(742)改福州为长乐郡,长溪县属长乐郡;唐乾元元年(758),改长乐郡为福州,长溪县属福州;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长溪县升为福宁州,辖本州和福安县、宁德县。怀安,今属福州市。清溪,今安溪,宋宣和三年(1121)清溪县改称安溪县。兴化军,宋代兴化军辖今莆田市、仙游市一带。清源,今仙游市,唐天宝元年改名仙游县。归化,今属泰宁市。剑浦,今属南平市。龙溪,今属漳州市。

北宋福建词人仅有 29 位,南宋则有 132 人,猛涨了 3 倍多。南宋时期的福建,被视为定都临安南宋政权的大后方,经济上也取得比北宋更大的发展,尤其是海外贸易的新拓展,使得福建经济更加繁荣,文化教育更为昌盛。据学者研究,除了每县有官学外,尚有大量的民间书院,几与官学相等,它们共同造就出文化精英。^{[4] 35-78}这些民间书院的设立主要是为了传播理学,虽然理学家大多不作词或反对作词,但他们所推行的高等教育确实提高了士子们的学问功底和创作才能,因而南宋闽词的勃兴实与理学的兴盛有莫大的关系,这是有意味的悖反。福建北宋进士 2 568 人,南宋进士 4 145 人,文化精英人士的增加,是词人数量增加的可靠保证。

(二) 地域分布的不平衡

福建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是词人地域分布不平衡的根本原因。福建北部的建州、福州、邵武军,东部的兴化军、泉州,以及中部的南剑州,共有词人 152 位,占宋代福建词人总数的(161)的 94%,其中具体籍贯不明者 3 人。这些地区就是福建经济文化的发达地区。

关于宋代福建经济发展的原因,有学者认为,与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耕作技术的提高最为密切。福建人口在宋初约 46 万户,北宋末年已有 100 多万户,南宋中叶高达 300 万人,是国内人口密集区之一。人口的增加是经济发展的基本保证,加之唐五代之际、南北宋之交,大批北方移民南下福建,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耕作技术,大大提升了闽人开发耕地的能力。福州、泉州、建州迅速从荒原上崛起,成为国内有名的中等城市,其他许多市镇升格为县镇。^[5]福州、兴化军、泉州处于福建沿海的平原地带,耕作条件优越,农业经济更是发达,加上靠海可开展海外贸易,经济优势明显。经济的发展是文化教育发展的前提。

北部的建州、福州,共有词人 88 位,占福建全部词人数的一半有余,尤以建州为突出,两个词人高产县均在建州。建州地处交通要道,为通往两浙的门户,乃人文荟萃之地,有“邹鲁”之称。加上朱熹在此地兴建书院,聚徒讲学,其门徒多承其衣钵,十分活跃,极大推动了本州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万历《建阳县志》卷一《风俗》云:“南宋朱、蔡、游、陈诸君子倡明道学,彬彬然为道义之乡……宋以前理学节义彬彬辈出,为海内前茅。”^[6]

建阳是宋代印刷重镇,朱熹《建宁府建阳县藏书记》中说:“建阳版本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7] 3475}印刷业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知识的传播。这些都是词人发达不可缺少的外在因素。

崇安人柳永的示范作用也是一大因素,北宋中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8]。南平状元词人、官龙图阁学士的黄裳对比他稍长的柳永极为推崇,其《书乐章集后》云:“予观柳氏乐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气象,如观杜甫诗,典雅文华,无所不有。是时予方为儿,犹想风俗,欢声和气,洋溢道路之间,动植咸若。令人歌柳词,闻其声,听其词,如丁斯时,使人慨然有感。呜呼!太平气象,柳词一写于乐章,所谓词人盛世之黼藻,岂可废耶!”^{[9] 69}柳永同乡、官中书舍人的胡寅在《词边词序》中说:“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加。及眉山苏轼,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后矣!”^{[9]78}他认为苏轼词超过了柳永,这是把柳永作为参照。黄、胡的看法,都可反映出柳永巨大的影响力。崇安有词人 13 位,居福建各县第 2 位,仅次于文化教育更为发达的建阳,不能不说与这位大词人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至于宋代福州文化教育的盛况,乾隆《福州府志》卷十一《学校》云:“朱子《学记》云:‘福州府学于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夫朱子所谓盛,盛以地亦盛以人也。溯建学法制大备于唐,福州学校,李椅兴于大历,常袞兴于建中。如日之升,必先启明;如春之至,必先谏訾。至朱子而日拂扶桑,春煦万类矣。”^[10]其他如兴化军、邵武军、泉州的文化教育发达的情况,地方志中多有记载,此处不赘。而漳州、汀州开发较晚,文化教育相对落后,故词人少出。

(三) 文化精英人士作词甚少

宋代福建进士数量位居全国第 1 位,福建绝大多数历史名人都是进士出身,著名词人柳永、李纲、张元幹、刘克庄等都是进士。前文说到近一半的闽词乃进士所作,但是在总计 6 713 名进士中,只有 1.31% 的进士作词或有词作传世。这一比例相当低,按理说进士更有条件从事艺术创作,但事实上并非如此。此中原因应是多方面的。其一,词乃小道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进士出身者更是将主要精力用于博取功名或建功立业上。大多数

有词传世的进士都是偶一为之,仅一首或数首罢了。其二,与理学家不主张作词有关。朱熹在《答孙敬甫书》中云:“小词,前辈亦有为为之者,顾其词义如何,若出于正,似无甚害;然不作更好也。”^{[7]3 061}虽然朱熹的影响只在南宋中后期,而且主要是在后期。但北宋杨时等人亲炙程门,薪火再传,在朱熹之前杨时等理学就在福建大地产生深远的影响了,闽地士人们注意力多用在明心正性上,诗词被看作余事。朱熹又秉承二程法旨(“作文害道”之语即出自《二程语录》卷一),终生讲学不辍,门人甚多,再传更多,“吾闽世守理学”^[11],难怪98%以上的进士都不屑于作词。闽人对理学的痴迷,清代道光至光绪年间的著名学者谢章铤曾大为叹息,其《归化县学教谕紫山刘君家传》有云:“吾闽自伸蒙子、海滨四先生以来,理学久已萌芽矣,将乐、延平相继,而兴及乎紫阳,遂集濂洛之成。逮兹数百年,都人士耳濡目染,失于迂拘者或有之,而行止卒不大远于矩矱。岂知迂流所极,顿至陵夷,其贤者以口耳为功绩,以学统为门面,其不肖者则且庠序其身、市井其心,盖自子之少而壮、壮而老,已不胜江河日下之危矣。”^[12]此可见理学对文学的负面影响之深。

二、宋代闽词中的地域风光

数百年词史塑造了词的多个创作区域,浙江、江西、福建分别成为宋词创作的三个重镇。探讨词的地域特征时,词人对所居地域地理风光的描写与反映不可忽视。

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云:“词贵得本地风光,张子野游垂虹亭,作《定风波》有云:‘见说贤人聚吴分。试问,也应傍有老人星。’是时子野年八十五,而坐客皆一时名人,意确切而语自然,洵非易到。”^[13]张先《定风波》述苏轼等六人在湖州垂虹亭欢宴一事,并未描写垂虹亭之景物,刘熙载为何生出“词贵得本地风光”的妙悟?词一向被视为艳科小道,多写男女私情,体格卑下,如能像诗文那样去描写风土人情,就可注入新鲜内容,起到抬高词品的作用,故特重词品的刘熙载看重这一点,这就是用词描写本地风光的之所以“贵”的原因。人物使江山增重,垂虹依旧,贤者毕聚,情景交融,倍添光彩,故后世每有踵事增华,效子野作六客词。审读宋代闽词,对于其中描写闽地风光的词作正可从上述视角去衡量。

宋代闽籍词人比较完整地描写闽地风光的词作有22首,主要描写了武夷山、双溪、福州横山阁、鼓山、九仙山的风光。描写武夷山风光的词有:柳永5首、李纲1首、刘清夫1首、刘应李1首、卓田1首、留元刚1首、葛长庚1首;描写双溪(含延平阁)风光的有严仁2首、张元幹1首、黄裳1首;描写福州横山阁风光的有李纲1首、李弥逊2首、张元幹2首;描写鼓山风光的有严仁1首;描写九仙山风光的有赵以夫1首。另有流寓词人辛弃疾描写福州西湖风光词6首。

描写武夷山风光,当以柳永词为代表。武夷山是闽赣的界山,碧水丹山,风景秀丽;有山峰三十六座,拔地耸天;有奇石九十九处,天造地设;有溪流九曲,山环水抱;有诸多寺院、宫观、摩岩石刻,极具神话传说,如武夷君、彭祖、十三仙、幔亭招宴等,诗意画境般的山水中散发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气息。著名词人柳永是崇安五夫里白水村人,对武夷山风景与人文传说甚是喜爱,用五首联章体《巫山一段云》记其事。其一云:

六六真游洞,三三物外天。九班鳞
隐破非烟。何处按云轩。昨夜麻姑陪
宴,又活蓬莱清浅。几回山脚弄云涛,仿
佛见金鳌。

“六六三三”即指武夷山,六六三十六,指武夷山中最著名的三十六峰,三三得九,指的是环山盘旋的九曲溪。有学者认为这首词写的是幔亭招宴的传说: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与皇太姥、魏王子骞辈,会乡人二千余人于峰顶,设彩屋幔亭约数百间,饮酒奏乐,尽欢而散。第二首写祭祀武夷君,第三、四、五首合咏武夷山中王母寿宴。^[14]可以说柳永是第一位用词讲述武夷山神话故事的大词人,从“词贵得本地风光”这一角度看,这组词很值得推广。

柳词所开创的描绘本地风光的传统在宋代其他闽籍词人中得到继承,大多围绕幔亭仙宴这一最能代表武夷山人文传统的典故来写。如刘清夫《念奴娇·武夷咏梅》:“疑是姑射神仙,幔亭宴罢,迤迤停瑶节。”葛长庚《满江红·咏武夷》:“夜半月华明似昼,玉皇降辇铺殿。笑曾孙、回首幔亭前,空松竹。”留元刚《满江红·泛舟武夷,午炊仙游馆,次吕居仁韵》:“风送清高,沿流溯、武夷

九曲。回首处，虹桥无复，幔亭遗屋。”

另一个为词人吟咏较多的地方是双溪，由剑溪（今称建溪）和樵川（富屯溪）在南平汇合而成。双溪阁位于偏于剑溪的城东。据《晋书·张华传》载，此地乃双剑化龙之处。辛弃疾有《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乃其仕闽佳作，表达了用“倚天长剑”扫清金虏的宏愿，抒发了壮志难酬的悲慨。闽籍词人描写双溪或延平阁，也紧扣双剑化龙的典故：黄裳《桂枝香·延平阁闲望》一面表达“腰间剑去人安在，记千年、寸阴何速”的时光飞逝之感，一面表达“山趋三岸，潭吞二水，岁丰人足”的欣慰，是北宋承平时期的写照；张元幹《风流子·政和间过延平，双溪阁落成，席上赋》写“不似碧潭双剑，犹解相将”的“天涯倦客”离情别绪，叹人世间聚少别多；严仁《归朝欢·南剑双溪楼》则感慨人世空幻，难遇识人之张华。

鼓山，不仅是文人觞咏行吟之地，更串联起系列文坛佳话。闽籍词人严仁有《水龙吟·题天风海涛呈潘料院》，词曰：

飚车飞上蓬莱，不须更跨琴高鲤。
 砉然长啸，天风湏洞，云涛无际。我欲乘桴，从兹浮海，约任公子。办虹竿千丈，糖钩五十，亲点对，连鳌饵。谁榜佳名空翠。紫阳仙，去骑箕尾。银钩铁画，龙拿凤翥，留人间世。更忆东山，哀箏一曲，洒露襟泪。到而今，幸有高亭遗爱，寓甘棠意。

“琴高鲤”，即琴高乘鲤，指登仙之物。唐陆龟蒙《高道士》诗：“东游借得琴高鲤，骑入蓬莱清浅中。”“紫阳”指朱熹，“东山”“甘棠”指赵汝愚。杨慎《词品》卷五：“赵汝愚《题鼓山寺》云：‘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常送海涛来。’朱晦翁摘诗中‘天风海涛’字题扁，人不知其为赵公诗也。严次山有《水龙吟》题于壁云（略）。此词前段言江山景，后段‘紫阳仙去’指朱文公，‘东山’、‘甘棠’指赵公也。赵诗、朱字、严词，可谓三绝。”^[15]经杨慎解说，此词所透露出的文化底蕴方显豁。徐焘《榕阴新检》卷十六《诗话》引《丹铅摘录》曰：“赵汝愚诗：‘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朱文公爱之，遂书‘天风海涛’字于石。今人不知为赵公诗也。

愚按：用修谓今人不知为赵公诗，即用修亦不知文公书在吾闽鼓山之巔。朦胧臧否，可发一笑。”^[16]淳熙十八年（1187），朱熹来闽拜访好友赵汝愚，不料赵已调任四川，朱熹率弟子五人上鼓山拜谒赵汝愚礼聘的寺僧，并留下短文一篇刻在石壁上。三年后赵汝愚复任福州，在鼓山见到朱熹之文，作《同林择之姚宏甫游鼓山》（绍熙辛亥九月廿日）诗：“几年奔走厌尘埃，此日登临亦快哉。江月不随流水去，天风直送海涛来。故人契阔情何厚，禅客飘零事已灰。堪叹世人只如此，危栏独倚更徘徊。”^[17]并将此诗刻在朱熹石刻右侧，成为一段佳话。“江月流水，天风海涛”已成写八闽景色的名句。后来朱熹又游鼓山，将“天风海涛”四字刻在鼓山另崩峰的石壁上。

乌石山南有横山阁，亦为文人流连栖息之处。主张抗战的李纲、李弥逊、张元幹罢官之后曾逗留此地，他们的词作透露出失意后的愤激情绪。以李弥逊《蝶恋花·福州横山阁》最为驰名。词曰：

百叠青山江一缕。十里人家，路绕南台去。榕叶满川飞白路。疏帘半卷黄昏雨。楼阁峥嵘天尺五。荷芰风清，习习消祥暑。老子人间无着处。一尊来作横山主。

闽籍词人描写闽地风光的词作不是很多，如果加上陆游、辛弃疾等外来流寓词家描写闽地风光的词作，数量也不多，但开此传统后明清闽籍词家描写闽地风光的词作骤增。以谢章铤为盟主的聚红榭同人就有大量描写闽地风光的词作。如果要编一部类似《皖词纪胜》将舆地纪与词选合二为一的书，尚需仔细清理发掘，有大量词作可编。

三、宋代闽词的人文精神

检视2000多首宋代闽词，两个现象突出，一是高扬爱国主义的抗战词数量多，占据主流，一是颂扬和谐人际关系和对生命充满祈盼的祝寿词也不少，亦为主流。两个方面的词都可以从闽的人文精神深处找到必然原因。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高扬

南渡后的一段时期，辛弃疾的词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影响最大。论者有“辛派词人”之称，指的是韩元吉、陆游、陈亮、刘过、杨炎正、戴复古、

刘克庄、吴潜、方岳、陈人杰、刘辰翁等,其中刘克庄、陈人杰为闽人。如果仔细检视,宋代福建词人中应有不少可归属到这一阵营中,包括陈瓘、李纲、邓肃、张元幹、李弥逊、刘学箕、冯取洽、黄昇等,其中李纲、张元幹生活在南渡时期,他们的词可视为“辛派词人”的先驱。

陈瓘是气节之士。李纲《了翁祭陈奉议文跋尾》称其文:“辞意之高洁、笔力之遒健,与昔见其容貌、志气、辩论,无少异焉。信乎养之完、守之固,而文章字画似其为人也。”^[18]李纲、张元幹、李弥逊都曾受到陈瓘的教导。李纲,“负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系社稷安危。虽身或不用,用而不久,而其忠诚意气,凜然动乎远尔”^[19],其7首咏史词,“表现出政治家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赋予了咏史词以强烈的时代精神和战斗性,词的言志功能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和体现”^[20]。李纲贬谪至沙县,结识邓肃,成忘年交。李纲与邓肃唱和诗极多,他们是情趣盎然的诗友。李纲上疏反对和议,张元幹在福州作《贺新郎·寄伯纪丞相》词赠之,以示激励;胡铨上书反对和议,请斩秦桧,张元幹在福州作《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予以声援,后来因此词被除名。李弥逊因主张抗战,忤权相秦桧,长年退隐故里连江。

宋金和议数十年后,局势相对稳定,但抗金收复失地的声音仍不绝于耳。刘学箕虽隐居山林,却未曾忘怀国事。其《贺新郎》序云:“近闻北虏衰乱,诸公未有劝上修饬内治以待外攘者,书生感愤不能已,用稼轩《金缕词》韵述怀。”冯取洽感于国事危殆,作《贺新郎·次玉林感时韵》云:“多少英雄沉草野,岂堂堂,吾国无君子。起诸葛,总戎事。”呼唤能有诸葛亮那样的英雄力挽狂澜。黄昇,早弃科举,雅意读书,但是忧患意识郁积心头,其《秦楼月·秋夕》云:

心如结。西风老尽黄花节。黄花节。塞鸿声断,冷烟凄月。汉朝陵庙唐宫阙。兴衰万变从谁说。从谁说。千年青史,几人华发。

陈人杰,享年不到30岁,面对蒙古军队猖狂进攻而南宋小朝廷仍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的现实,他在《沁园春》中愤然唱道:“诸君傅粉涂脂,问南北战争都不知!”并大书杭州丰乐楼,以泻心中郁

积之气。刘克庄生活在南宋中晚期,国势衰败难以挽回,对此他有清醒认识:“国脉危如缕”(《贺新郎》)、“城危如卵”(《贺新郎·杜子昕凯歌》),显得焦虑沉痛。

福建词人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期,大多高扬抗战的旗帜,爱国深情相当激越。其原因为何?据刘庆云先生统计,53位闽北词人中至少有26位系理学家及其门人或深受理学影响的人。刘先生并指出,一批理学家或担任福建的地方官,或在朝中任职,像胡寅、刘珙、朱熹、真德秀等即在朝中为官,他们都是正直敢言的节义之士,对时风的影响表现出积极的作用。^[21]杨时历仕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主张抗金,力排和议,因主张不被采纳,退而著书讲学。建炎三年(1129),胡寅上书认为“中兴”要务在于“拔乱世,反之正”,论者认为:政治与词学上的“拔乱世,反之正”是相并而行,相辅相成的。^[22]朱熹认为华夷之辨高于君臣之分,力主抗战,其《壬午应诏封事》云:“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也义理明矣。”^{[7]573}其《书张伯和诗词后》论张孝祥词云:“读之使人奋然有擒灭仇虏、扫清中原之意。”^{[7]3981}他的人格和学说在福建士人特别是在闽北士人中影响深远。方勇先生指出:“福建的学子们正是遵循着朱熹所指引的道路前进的。尤其在宋末元初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他们更加重视务实躬行,把民族气节看得高于一切。”^[23]李纲、张元幹以及仕闽的辛弃疾的爱国词也起到了不小的示范作用。宋代闽词中爱国词发达,可谓渊源有自。

福建爱国词发达的原因与闽人性情气质也很有关系。谢章铤在《闽省形势答权守某公》中论闽地民风曰:

闽,海滨之奥区也。以守易,以战难;自卫有馀,援人不足。然而,深林密箐,萑符易生;绝岛汪洋,孙卢不绝。是故上游必治山,下游必治海,不然处处皆寇资也。且夫闽地踈薄无生产,人多农少,资于田者二,资于山者二,资于海者二,资于商贾者四。其人椎鲁强干,疾贫好斗。呜呼!瘠土使之然欤?然其性质直,易恩易威,苟得欢心,刎颈相赴。盖闽山多截崖,陡绝千仞,无所依附;水则各自为源,不乞馀波于邻省。得于山水

盘郁之气，故其性情为独厚。且中间惟广至闽间有坦途，其他界江西、界浙江。大抵一夫当关，飞鸟难度。用其人卫其地，事半功倍，是诚形胜为之助欤？虽然，习其阨隘，不利于平原；逐末为生，闭关则立毙。其心善恋乡，其俗易煽动，宜守不宜战。使微功于千里之外，用违其材，则山川不为是分谤也。嗟乎！峻冈巨岭为天险；危溪深泽为地险；众志成城以死卫上为人险。人险不修，二险无恃。仙霞岭，山之险者，马、阮南窜，直下渔梁矣；五虎门，水之险者，郑氏扬帆，竟抵南台矣。呜呼！形胜虽佳，何补哉！去门户，守堂庭，盗扼其吭而四肢不灵矣。^[24]

谢章铤论闽人的性情气质，是据历史上和同时代闽人而立论，所论闽人“性质直”“刎颈相赴”“性情为独厚”“善恋乡”等特点，无一不适合宋代闽人。即使只从“善恋乡”这一条来说，也很符合宋代闽籍词家，如李纲、张元幹、李弥逊被斥退后都回到闽地生活。由上可知，宋代闽词颇多梗概之气，此与词家所受到的理学教育有关，也与他们的性情气质有关。

（二）寿词创作的兴盛

两宋闽籍词人共有48人创作了157首寿词，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据刘尊明先生统计，宋代有寿词1860首，占《全宋词》作品总数（21005）的1/8弱，其中有姓名可考的作者约431人，占《全宋词》作者总数（1494）的1/3弱。^{[25]135-162}可知：宋代闽籍词人中寿词作者占全部宋代寿词作者1/10强，而所创作的寿词占全部宋代寿词1/8强。北宋有省级行政单位24路，南宋有17路。在全国范围内看，福建寿词创作是比较突出的。在福建全省范围内看，寿词作者占全省词人30%，词作量占全部闽词的6.8%，也有相当的比例。

刘尊明先生曾分析宋代产生大量寿词的原因，除了祝寿成风这个外在的客观原因外，还有祝寿风气兴盛的文化因素和寿词创作繁兴的内在机制。文化因素包括游乐风气、社会心理、理学的兴盛诸方面，而内在机制则包括音乐属性和娱乐功能的作用、“应社”的外部需求与“自寿”的主体需

求。^{[25]135-162}宋代闽词中寿词的大量出现也是内部与外部需求的必然结果。

淳熙《三山志》卷四十说：“（元旦）是日享祀毕，序拜称觞祝寿于尊者。”^[26]一年开元，闽人想到的是为尊者祝寿。咸丰《榕城岁时记》载：“八月十五日，家家备果酒牛乳诸物，延道士禳醮，曰忏斗。”^[27]所谓忏斗，即南斗主生，北斗主死，因而拜南斗为求长寿，拜北斗为求消灾解厄，保命延年。词因其适合宴席歌唱这一内在机制，留下了对这一风俗的描述与反映。宋代福建寿词中有一首很别致，建阳人卓田《醉江月·寿詹守生日在武夷设醮》云：

武夷山字，是使君衔上，新来带得。便觉闲中多胜事，满眼烟霞泉石。云卷尘劳，风生芒竹，去作山中客。晓坛朝罢，自然五福天锡。当此孤矢悬门，步虚声远，直透云霄碧。替却燕姬皓齿，洗尽人间筝笛。九曲溪深，千岩壁峭，大寿应难匹。辑车有待，日边飞下消息。

这是宋代闽词中唯一的一首关于宋代“设醮”庆寿风俗的记载。《仪礼·士冠礼》：“若不醴，则醮用酒。”注：“酌而无酬酢用醮。”^[28]这位詹守在“九曲溪深，千岩壁峭”的武夷山中做寿，没有太多的应酬，是为“难匹”。他的寿席雅洁而简单。闽地祝寿风气颇浓，一些有名望的人寻求避寿，避寿也成为一种风气。这位詹守在武夷山“设醮”，似有避寿的意思。

宋代福建寿词发达尚有深厚的地域文化的原因。北宋时期，福建是儒学相对发达的地区，但儒学中心在洛阳，通过将乐人杨时、南剑州人罗从彦、南平人李侗、尤溪人朱熹的递相传道，儒学鼎盛，南宋闽北成为全国的儒学中心，后人称之为理学。“朱熹所建构的理学体系虽然繁博宏富，包罗万象，但其至关重要核心仍是伦理学本体。”^[29]通过祝寿仪式来宣传和确立伦理道德秩序，就比较容易为社会各阶层认同与接受。闽人“得于山水盘郁之气，故其性情为独厚”，做寿是主人宾客交流情感的一种方式，是他们性情厚重的一种体现。朱熹今存寿词1首，名为《满江红·刘知郡生朝》，其门人亦多有作寿词者。

无论是爱国词还是寿词，都反映了福建士人

的正当愿望,即渴望国家的统一与人际关系的和睦相处,自有内在的联系。

四、结语

宋代闽籍词人的地理分布,与福建省(路)的文化格局关系极大,福州府雄踞福建文化的中心,故词人最多。宋代福建进士总数居全国第一位,

宋代闽词有近一半是进士所作。福建进士中只有极少一部分作词,这一现象与整个宋词作者的身份高度近似,可以说明词不是宋代文化精英所看重的文体。宋代闽词多爱国词和寿词,有张扬爱国主义旗帜和通过做寿增进和睦人际关系的两大特征,这与福建理学的熏染和闽人的性情气质极有关系。

参考文献:

- [1] 刘荣平. 全闽词[M]. 扬州: 广陵书社, 2016.
- [2] 王兆鹏, 刘学. 宋词作者的统计分析[J]. 文艺研究, 2003(6): 54-59.
- [3] 刘锡涛. 宋代福建人才地理分布[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 112-116.
- [4] 刘海峰, 庄明水. 福建教育史[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 [5] 徐晓望. 论宋代福建经济文化的历史地位[J]. 东南学术, 2002(2): 143-152.
- [6] 苏民望. 万历建阳县志[M].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1: 285.
- [7] 朱杰人, 严佐之, 刘永翔. 朱子全书·晦安先生朱公文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8] 叶梦得. 避暑录话: 卷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137.
- [9] 陈良运. 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8.
- [10] 徐景熹. 乾隆福州府志[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 253.
- [11] 谢章铤. 董母杨太淑人六十寿序[M] // 赌棋山庄文续(卷二), 清光绪壬辰福州刻本, 1892: 34.
- [12] 谢章铤. 赌棋山庄文续(卷二)[M]. 清光绪壬辰福州刻本, 1892: 22.
- [13] 袁津琥. 艺概注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9: 568-569.
- [14] 黄胜科. 柳永笔下的武夷山闽越掌故[M] // 石子镜, 杨长岳. 武夷山与古越文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118-126.
- [15] 岳淑珍. 杨慎词品校注[M].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3: 262.
- [16] 陈庆元. 晚明闽海文献梳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724.
- [17]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全宋诗[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30021.
- [18] 李纲. 李纲全集[M].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1490.
- [19] 脱脱等.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1273.
- [20] 袁行霈. 中国文学史: 第3卷[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135.
- [21] 刘庆云. 宋代闽北词坛鸟瞰[J]. 阴山学刊, 2003, 16(5): 40-46.
- [22] 沈松勤. 宋室南渡后的“崇苏热”与词学命运[J]. 文学评论, 2005(2): 15-25.
- [23] 方勇. 南宋遗民诗人群体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94-95.
- [24] 谢章铤. 赌棋山庄徐集(文集卷一)[M]. 民国十四年刻本, 1925: 3-4.
- [25] 刘尊明. 唐宋词综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26] 梁克家. 淳熙三山志[M] // 王晓波, 李勇先, 张保见, 等. 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1641.
- [27] 戴成芬. 榕城岁时记[M]. 春榭斋抄本: 29.
- [28]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956.
- [29] 冯天瑜, 何晓明, 周积明. 中华文化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650.

(责任编辑: 王圆圆)